

近代新疆政治经济开发特点简析

祁美琴

【摘要】与其它地区相比，新疆的政治开发具有明显的超前性。这种超前性主要表现在新疆建省、盛世才的“六大政策”、省联合政府的成立三方面。对近代新疆经济开发，本文从其过程、层次、效果三方面进行剖析。

【关键词】近代 新疆 开发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1)04-0097-07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Xinjiang

Compared to other borderlands,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Xinjiang was distinguished by three aspects: the establishment of Xinjiang province, “the six policies” of Sheng Shicai, and the creation of a unified provincial government. The article analyzes process, administration, and result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Xinjiang.

近代边疆开发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经济的发展又与政治环境的好坏密不可分，这一点在中国近代边疆的开发中也不例外。以地处中国北部、西北部、西南部边疆的内外蒙古、新疆、西藏来说，虽然它们在几乎是同一时间受到了外敌的入侵、外国势力的渗透，又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步入了近代社会的门槛，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的差异，它们的社会上层在近代的历史发展中各自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从而决定了它们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开发上也经历了各不相同的历史轨迹。与西藏、内外蒙古相比，近代以来新疆的政治生活基本上是沿着中央政府所需要、所规范或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因此其经济发展与边疆开发也基本上体现了这一特点。同时，近代新疆开发的这些特点也大体上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央政府的治边政策、中央与边疆地方的关系、边疆开发的成效以及社会影响等。

因此新疆开发的特点具有典型性，有必要给以分析和总结。本文主要从政治、经济方面进行分析。

一、近代新疆政治开发的主要特点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清朝的日渐衰落和边疆危机的不断加深，可以说通过政治开发来维护和加强在边疆地区的统治已成为统治者的共识，而边疆的政治开发首先体现为与内地在行政体制上的划一，清末的新政、北洋政府与国民党把在边疆地区推行设省置县作为其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一体化”的过程也有很大差异。而走在最前面的、成效最为显著的就是新疆地区，这与新疆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条件有关。与其他边疆地区相比，新疆的政治开发具有明显的超前性，这种超前性主要表现在新

【收稿日期】2001-7-10

【作者简介】祁美琴（1964—），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北京 100872

疆建省、盛世才的“六大政策”、省联合政府的成立三个方面。以这三个方面为历史转折点，新疆近代的政治开发不仅带动了经济开发，而且远远走在了西藏、内外蒙古的前面。

1、新疆建省

1878年左宗棠率领的进军西北的大军，将阿古柏入侵者赶出了新疆，1881年通过曾纪泽的外交努力，又从沙俄手中收复了伊犁地区，1884年清政府决定新疆与甘肃联合建省，由在收复新疆过程中功绩卓著的杰出将领刘锦棠出任第一届的甘肃新疆巡抚，这就是新疆建省。这一举措，标志着清代边疆行政体制的重大变革，“这一制度的革新成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①。其“里程碑”的意义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新疆建省打破了有清一代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的“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的格局，标志着以伯克制和札萨克制为核心的新疆军府制度的终结，开启了以州县制为主体的行政建制在民族地区实行的先河，为清政府及其以后的民国政府巩固在新疆的统治、加强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新疆建省的实质是废除了新疆维吾尔族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封建农奴制度，这种以维护伯克对维吾尔族农民的封建特权为目的的制度，既制约了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关系，不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深受广大维吾尔族人民的痛恨。新疆建省，彻底结束了伯克制的历史命运，使其退出了新疆的政治舞台，为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新疆扫清了道路。

其三，新疆建省改变了建省前行政建制不统一——哈密、乌鲁木齐由陕甘总督管辖；伯克制、郡县制、札萨克制并存——的局面，将军政大权统于巡抚，有利于增强新疆地区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能力。建省后的移民实边，对巩固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关系、充实边防力量、抵制沙俄侵略势力的渗透，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四，新疆建省促进了新疆的经济开发。在近代新疆的开发史上曾经有过三次高潮，而第一次就是伴随着新疆建省而开始的。为了恢复战后残破的经济，清政府改革了旧有的田赋

制度、屯田制度、采矿制度，允许人民移民新疆，从而加快了新疆经济的发展。

2、盛世才的“六大政策”

辛亥革命后的新疆，虽然被封建军阀所控制，但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他们在各自的统治期内，为发展新疆的经济或多或少都做过一些事情。尤其是1933年盛世才上台以后，为了应付内外交困的局面，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联俄联共，公开标榜政治进步，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使新疆的面貌为之一新。其政治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六大政策”的实行，表明盛世才政权已由过去的封建军阀政治向开明、进步的政治生活迈进，也公开表明新疆的地方政权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政治倾向上的区别。为体现民族平等，一些省政府机关的领导职务由民族人士担任；成立“新疆民众联合会”，处理民族问题；建立“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确立新疆永久为中国之领土，反对帝国主义。这些在当时代表了新的社会发展方向和社会的进步力量，是新民主主义对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胜利在新疆的特殊体现。

其二，“六大政策”的实行，表明盛世才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结成了联盟，这就为此后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疆成为苏联援助中国以及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交通要道，奠定了基础。同时，盛世才也得到了苏联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无私的援助，1937年苏联红军帮助盛世才平定了南疆的马虎山叛乱，巩固了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

其三，“六大政策”的实行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苏联和盛世才关系的密切，盛世才主动邀请中共干部到新疆工作，所以从1934年起，除一批在苏联的中国籍联共党员先后被派往新疆工作，根据共产国际重视新疆工作的指示和盛世才的邀请，中共中央也派出大批干部参与新疆各项建设工作，包括一些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他们主要分配在行政、财政、民政、教育、文化、新闻等部门工作，许多人担任了领导职务。由于他们出色的工作和新疆人民的共同努力，新疆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特殊

的贡献。

其四，“六大政策”的实行，使新疆成为抗战前夕和抗战岁月里中国国统区内最民主、最有希望的地方，成为许多民主人士、进步人士、有志青年向往的地方、实现抱负的地方。许多人为此不远万里、背井离乡，来到新疆，寻找新生活。虽然后来由于盛世才的背叛和破坏，一些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受到迫害和屠杀，这一新局面夭折了。但是，建设新疆的观念已深入新疆人民的心中，新疆的政治生活从此不会再回到国民党需要的轨道上来了。这就是省联合政府的成立。

3、省联合政府的成立

1944年8月国民党政府决定将盛世才调离新疆，出任农林部长，9月11日盛世才在万民声讨中离开新疆。国民党接管新疆之时，新疆爆发了反对盛世才与国民党统治的三区革命，成立了三区革命政权。三区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影响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到1945年8月，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三区革命政府已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联成一片，在军事上处于节节胜利的有利地位。但在国内外形势影响下，为顾全大局，三区方面愿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1946年1月2日，张治中代表中央政府、阿合买提江等代表三区政府在《和平条款》上签字，改组新疆省政府，1946年7月1日，三区与国民党正式成立新疆省联合政府。虽然由于国民党的破坏和内战爆发，这个政府只存在了一年，是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地区的特殊的产物，但在当时的中国，它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它的意义在于：

其一，新疆省联合政府是在国共两党、中苏关系趋于缓和、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它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长期影响是分不开的，它代表了新疆大多数人民的意愿，是进步的政府。

其二，新疆省联合政府是国民党政府在加强对全国的统治的历史时期产生的，也是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边疆民族地区产生的，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它的政策有“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但它并不是民族“独立”或“自治”的产物，而是国民政府时期新疆政治生活发展的产

物。

其三，新疆省联合政府的成立表明新疆的革命力量和进步势力的壮大和发展，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受到了挑战，为不久以后新疆革命的继续发展和新疆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近代新疆经济开发的主要特点

近代新疆的经济开发是在近代新疆社会性质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被迫开始的，是与当时的政治军事的需要密切相关的，这就决定了开发的规模是有限的，开发的速度是缓慢的，开发的性质是浅层次的。尽管如此，近代新疆的经济仍然走过了一条独特的开发之路，这里主要从开发的过程、开发的层次、开发的效果三个方面作一分析。

1、开发过程

近代新疆的经济开发从过程上看，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伴随着新疆的收复、建省而开始的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建设新疆的时期。19世纪下半叶的新疆经济在阿古柏和沙俄的掠夺和战乱的破坏下，到清军收复新疆时，整个天山南北“城市邱墟，人烟寂绝”^②，“膏腴之地，尽化污莱”^③。到处是一幅残破、萧条的景象。左宗棠、刘锦棠等在收复新疆以及战后为恢复经济作了许多努力。以刘锦棠为例。刘锦棠是处理新疆善后事宜和新疆建省的具体执行者，他当时为恢复和发展新疆的经济采取了许多重大的措施。^④主要有：

其一，安置、赈济流民。在“荡析离居，存者无几”的情形下，招集流亡难民、尽快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各项生产是当务之急。刘锦棠先后收抚、安置难民达十六、七万，业农者给以牛、种，业牧者送回牧地，有的还拨与银两救济。此外用“以工代赈”的办法，既救助了被灾的难民，又减少了农民差徭的负担，修复了道路、水利等设施，一举数得。

其二，修治河道、驿道。新疆是绿洲农业，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命脉这句话在新疆有着更为深切的含义。刘锦棠为修复年久失修的水利设施，专门设置水利管理人员，管理水利建设事宜。同时对毁于战火的道路、桥梁和驿

站，也进行了全面的修复、整治。

其三，改订屯田章程。清代新疆的屯田本来有旗屯、兵屯、民屯、回屯、遣屯等，战乱之后，各屯“地亩荒芜，耕者不及十分之二”^⑤。刘锦棠为扩大生产，制定了以发展民屯为主要目的的“新疆屯垦章程”，鼓励内地农民移民新疆，参加屯田生产。

其四，减征赋税。为尽快恢复生产，刘锦棠改订税则，实行与内地相同的“摊丁入亩”制，采取较内地更轻的“十一分而取其一”的新税则，从而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热情。

其五，整商置税。左宗棠为解决新疆的财政困难，于1878年开始在新疆各地设卡征税，但是《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根据条约的有关规定，俄商享有在新疆各地贸易暂不纳税的特权，而华商则依旧章纳税，这就严重损害了华商的利益。因此，1882年在刘锦棠的建议下，清政府下令华商“暂免税厘”，从而为新疆的商业繁荣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新疆商业的发展，刘锦棠又根据行业和地区的情况，设税局征税。

其六，统一币制。清代新疆南北币制不一，南疆使用的是普尔钱，北疆是制钱。阿古柏占领南疆后，又铸造了天罡钱。这些钱币在新疆收复时都一起在市场上流通，币制十分混乱。刘锦棠为使新疆货币在省内统一，禁止制钱、天罡钱在新疆流通，改铸红铜普尔钱，从而便利了人民的生活和政府的财政税收。

第二次高潮是伴随着清末新政和民国之初杨增新督新而开始的。开始于1901年的“新政”主要是“实业新政”，当时也有一些计划和措施，但是由于很快清政府就垮台了，所以新政的许多内容实施的很少。1912年杨增新统治新疆后，全国军阀混战，新疆在财力、粮食等方面得不到中央政府和内地的支援，新疆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和粮食危机，为了摆脱困境、巩固统治，杨增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新疆的经济进入一个持续发展的阶段。其中主要有：

其一，在“开渠垦荒”、“振兴农业”^⑥方面，当时的主要措施有二：一是振兴水利。杨增新在巡按使署内设立了新疆水利委员会，负

责勘察水源，筹划全疆水利事宜。实施的重点是整修旧渠和旧坎尔井。在具体承办过程中，采取了官办、民办、官民合办等形式，以解决财力不足问题。二是在土地开垦方面，主要通过“拨兵屯田”、“招民租种”、“招民承垦”等方式，扩大垦荒的面积，增加财政收入。

其二，在发展农业的同时，杨增新也注意工矿、交通、邮电等近代新兴产业的引进和发展。在倡导“振兴实业”的口号下，创办了炼铁厂、石油公司、皮革厂、发电厂和一些矿业，但是由于资本、销路、产量、交通、技术、人才、经营等都存在问题，成效不大。

其三，杨增新为便于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省内的交通运输。1920年他在迪化设立了公路局，拨款修筑公路。1925年设立汽车训练班，培训汽车驾驶员和汽车修理工。1926年从天津购买了30辆客车和货车，用于发展交通运输。1927年正式成立迪化汽车运输总局，修建了汽车修理厂。

其四，民国以来新疆的邮电也有了一定的发展。1913年开始新疆邮政隶属于北京政府邮传部。邮政机构主要有迪化设立新疆邮务管理局，此外全省设一等局1处、二等局20处、三等局4处、代办所43处。到1927年，新疆在迪化设立电政管理总局，各地设二等局8处、三等局11处、报房8处。为加强新疆与北京的联系，1923年又安装了无线电发报机，1927年正式设立迪化电报局。

第三次高潮是盛世才督新时期，由于“六大政策”的实行，新疆的近代化的经济开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继杨增新之后统治新疆的金树仁，是一个迷信武力、无视新疆各族人民死活的军阀，由于他的暴政，酿成“哈密事变”，使新疆又陷入战乱之中。1933年4月12日，金树仁在政变中倒台，新疆的军政大权落在了又一个野心家盛世才的手中。盛世才上台后，在苏联的军事援助之下，盛世才巩固了统治地位，并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下，制定了具有进步意义的“六大政策”。在这一总目标下，从1934年开始，新疆经济进入了恢复和发展时期。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其一，恢复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为了恢复农业生产，要求各地政府把扩大春耕生产、安

置逃民作为首要任务；机关职员、教师学生组成宣传队，动员农民恢复春耕生产。在耕作技术上，引进苏联较先进的技术，开始使用农业机械；开办各种农业试验场、农牧讲习所，加强对种子、栽培技术的改良和工作人员的培训。在畜牧业方面采取了禁杀耕牛和母畜、培养兽医人员，通过兽医站、巡回兽医所等机构加强疫情的防治。

其二，近代工业的发展。盛世才为发展经济，制定了三期三年建设计划：第一期1937—1939年，第二期1940—1942年。第三期由于盛世才公开反苏反共，后又调离新疆，没有实现。但是在前两个时期内，由于苏联的援助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努力工作，新疆在工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主要有发电厂、印刷厂、机器修理厂、食品加工厂、纺织厂、木材加工厂、矿厂等等。

其三，交通运输与电讯事业。在公路的修筑方面，据统计，这一时期公路建设的结果，全省有了3422公里平坦的新路2439座大型、中型、小型载重25吨的桥梁。^⑦至1942年底，新疆有汽车1100多辆、汽车站37个、修造厂3个、汽车驾驶员1315名。在航运方面，1939年中国与苏联共同开辟了哈密—阿拉木图航线，飞机和机组人员均由苏方提供，一周往返一次。在此之前，还开通了重庆至哈密的渝哈航线，中央航空公司在哈密设立了办事处，但航班很不正常。电讯方面，1934年以前新疆只有1座无线电台，1942年增加到23座，重庆与迪化可以直接通话，到1943年全省电话线路达3896公里。全省有线电报线同电话线一样长，设有电报局31处。^⑧

其四，整顿财政金融。金树仁时期，新疆财政金融状况严重恶化，盛世才上台后，把整顿财政金融作为一项主要任务来抓。1934年聘请苏联专家哈尔曼为财政顾问，对财政收支进行了改革，建立了一些规章制度。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将原税局改为消费局，不久又将消费局改为财政局，隶属于财政厅。全疆共设14个财政局，其下又设财政分局作为财政厅的税收机构。金融方面，改组了新疆省银行，提出银行为工农牧业开发和建设提供贷款。1934年成立财政监察委员会，1935年颁布惩

治贪污条例十二条，规定贪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纵观新疆近代经济开发的三次高潮，可以说，每一次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由于开发的被动性和受时局的影响，使这一时期的开发与内地相比，是缓慢的、时断时续的。

2、开发层次

一般来说，“开发”就是“利用”，只要是目前还没有被利用的自然资源，经过人们的劳动而成为利用的对象，就可以视为开发。从这个意义上看，开发的对象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开发—恢复—发展。开发是指在以往的生产生活中尚未利用的对象进行利用的过程；恢复是指在以往的生产生活中已经得到开发，由于战争或自然灾害等原因而被破坏的、弃置不用的对象，因为现实的需要对它重新进行开发的过程；发展是指对在以往的生产生活中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开发，但还有进一步利用的价值的对象进行再开发的过程。据此我们可以把近代新疆经济开发的层次也限定在这三个方面，不过，依据历史实践的过程，开发总是在恢复与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这里我们也按这一顺序进行阐述。

其一，恢复方面。由于开发的时断时续，因此每一次开发的过程首先表现为经济的恢复的过程。如在第一次开发高潮中，安置赈济灾民，修治河道、驿道；第二次高潮中，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第三次开发高潮中，恢复农牧业生产等等内容，都属于对以往开发的恢复的范畴。

其二，发展方面。近代新疆开发的历史过程证明，每一次开发高潮都在恢复经济的同时，必然伴随着一些经济领域的向前发展。如在第一次开发高潮中，改订屯田章程，减征赋税，整商置税，统一币制；第二次开发高潮中，在土地开垦方面，实行“拨兵屯田”、“招民租种”、“招民承垦”等方式，扩大垦荒的面积，增加财政收入；在第三次开发高潮中，交通运输、邮政电讯等不断发展。总之，任何事物的发生，都不可能是简单的重复发生，而是在重复中发展，在重复中前进。

其三，开发方面。这里开发的意义在于新

生事物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三个高潮中的典型事例如:刘锦棠在新疆实行“摊丁入亩”,杨增新创办近代实业,成立汽车运输总局、邮政局、电报局等,盛世才时期农业技术、农业机械的引进和近代工业的创办、航运的开通等等,内容很多,越接近现代,近代化的开发也越多,新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越来越高。

3、开发效果

在边疆民族地区近代化的开发过程中,由于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疏离,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出于现实的需要,虽然也实行过一些开发的措施,但是主要是为军事建设服务的,单纯的经济开发的内容并不多,无法与新疆相比。同样,处于中国北部边疆的内外蒙古,由于开发者(主要指中央政府和日本占领时期)以剥夺当地上层的特权和牧民的土地等资源为目的,使这一地区的近代开发变成了一次大掠夺,结果外蒙古独立,从中国土地上分离出去,内蒙古的民族独立运动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开发的效果也就很难评说了。新疆则不同。新疆的开发主要是靠历届主政新疆的统治者来完成的。他们或者出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巩固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统治需要,或者出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需要,在他们的统治期内,或多或少,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作出了贡献,从而成为新疆经济开发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这是新疆经济开发得以持续和不断发展的基本保证。具体而言,近代新疆经济开发的效果体现在许多方面,这里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探讨。

其一,土地方面。据统计,经过新疆建省前后的发展,到1911年,新疆已开垦种植、并有水可灌的熟田10,554,705亩,平均每人可占有基本旱涝保收的土地约5亩,超过同期全国人均耕地占有面积近1倍。岁征京斗粮302,407升,额征本色草28,273,039斤,粮草折色库平银90,490余两。这些数字都是史无前例的。^⑩而经过民国初年的恢复和发展,到1918年,新疆耕地已达到12,026,787亩,比1911年增加1,472,082亩,粮食产量达到14,530,000石,棉花产量达到20,930,000斤。到盛世才统治时期,由于近代农业机械在农垦中

的大量使用,耕地面积大量增加,1933—1944年间,新疆耕地从4,634,567亩增加到16,800,912亩,成为新疆历史上耕地最多的时期。同时,由于农业技术的运用,粮棉产量也创造了新疆历史上的最高成绩:其间,粮食产量从4,600,000石增加到11,735,380石,棉花产量从21,184,000斤增加到283,380,000斤。

其二,人口方面。新疆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⑪关于新疆人口的统计,最早见于乾隆时修纂的《西域图志》,当时的新疆总人口为383,750人^⑫,这一数字一直到嘉庆年间变化不大。但是经过新疆建省和清末的近代开发,新疆人口的变化是惊人的。到1911年,新疆全省人口共453,477户、216,2030人,经过民国年间的发展,新疆的全省总人口的调查数字分别为:1916年内务部的调查结果是新疆总人口为2,278,727人;1922年新疆邮局的调查结果是新疆总人口为2,500,000人;1926年新疆邮局报告的人口数字为2,680,883人;1928年内政部调查的结果是新疆总人口为2,551,741人;1936年来自内政部的统计新疆总人口为4,360,000人。^⑬到1949年底全疆总人口为4,333,400人,其中北疆107.35万,南疆325.99万,全疆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6人。新疆人口的分布,如按南北分布看,则南疆占75%,北疆占25%;如按东西区划,西部占84%,东部占16%。由此可见,新疆人口大多集中在西部靠近国界的地方,且偏于南部。虽然与内地相比,新疆仍然是地域辽阔,人烟稀少,但是在近代化的开发过程中,新疆的人口增加了一倍,也是不容质疑的事实。

其三,商业城镇方面。近代新疆,随着农业、牧业、手工业、工矿业等经济门类的历史性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的交换和各地商品市场与商业城镇的形成。这就是北疆的乌鲁木齐由商业中心而发展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陲的伊犁、塔尔巴哈台由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而发展成为外贸中心,东部的哈密从羊毛市场而发展成为重要的货物中转市场,南疆的喀什噶尔由地方市场而发展成为每年有数千名“来喀”贸易的西南边陲最大的商业中心。^⑭它们的出现和繁荣,标志着新疆近代商业城镇的最

终形成。

其四，对外贸易方面。以对俄贸易为例。新疆与俄国的贸易往来由来已久，但在近代以前贸易额是十分有限的。随着近代以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新疆的对俄贸易增长很快。其中俄国与新疆的贸易总额的变化是：1850 为 74.15 万卢布，1884 年为 210 万卢布，1895 年为 759.3 万卢布，1899 年为 1109 万卢布，1901 年为 1293 万卢布，1905 年为 1541 万卢布，1908 年为 1798 万卢布，1913 年为 1831.8 万卢布，1914 年为 2525.8 万卢布。^⑧1934 年为 1067.5 万卢布，1936 年为 6181.6 万卢布，1938 年为 7858. 万卢布，1941 年为 9079.7 万卢布，1946 年为 4760 万卢布，1949 年为 7200 万卢布。^⑨新疆出口苏俄的商品由最初的茶叶到后来的土畜产品、农产品，新疆进口的商品也由开始的纺织品、食品、手工制品等发展到后来的机械产品、通讯设备、军火等。这些变化正是在近代新疆开发过程中发生的，是新疆经济开发的标志性成果的一个方

面。

其五，环境方面。近代新疆的开发主要是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和利用，这就必然引发新疆的环境问题。以清朝为例。统一新疆的乾隆中期，新疆的总人口不过 30 万，耕作面积不过 100 多万亩。经过此后 100 多年的发展，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开发，到 1911 年新疆的人口已达 200 万，耕地面积 1080 万亩，人口增加 6 倍，耕地增加 10 多倍。而农垦的发展的直接后果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新疆历史上南农北牧的局面，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新疆的自然风貌，大片的森林和草莽之地先后被改造成沟渠纵横的耕作区域。这种生态环境的改变，不仅使多种经济结构的发展受到制约，而且造成水资源的匮乏和大面积的土地沙化，生态环境的恶化也日趋严重。新疆是绿洲农业，绿洲的生命是水。新疆生态环境恶化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在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存环境的前提下的开发，才是新疆开发的未来。

①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 115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中译本。

② 《清军西征后古城、济木萨地方情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朱批奏折·民族事物类》，卷 625。

③ 《新疆图志》，卷 73。

④ 参见管守新《刘锦棠恢复和发展新疆救济的重大措施》，《西域研究》1995 年第 4 期。

⑤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 319。

⑥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丁集下。

⑦ 李溥霖：《十年来新疆经济建设》，转引自《新疆风暴七十年》，第 4722 页。

⑧ 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第 340—341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⑨ 《新疆屯垦史》下册 749 页；《新疆经济开发史研

究》上册，155 页。

⑩ 从民族成分看，新疆有 14 个民族，维族人口最多，当时称缠回。

⑪ 王致中、魏丽英：《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第 39 页，三秦出版社 1989 年版。

⑫ 许崇灏：《新疆志略》，第 80 页，正中书局 1947 年版。

⑬ 魏丽英：《论近代西北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甘肃社会科学》1996 年第 4 期。

⑭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第 139—140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⑮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第 479、553 页。